



大寨高风

燕 凌 著



报告文学

大寨·高风

燕凌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太原

大 寨 高 风

燕 凌 著

廉 振 华 插 图

★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山 西 印 刷 厂 印 刷

★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42·2 $\frac{16}{21}$ 印张·4插图·46,000字

一九六四年六月第 一 版

一九六四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2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·496

定 价：(五)二角三分

內 容 介 紹

昔阳大寨村，过去是个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門就爬坡”的貧瘠的地方。解放以后，党的阳光和雨露溫暖和滋育着大寨的土地，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大寨建設起来。大寨，成了建設山区的一面旗帜，大寨的名字越过了太行山，傳遍了全国。“大寨高风”就是描繪大寨天翻地复变化中的动人事迹。

这本书包括两个部分：“在农村陣地上”和“集体的脊梁骨”。“在农村陣地上”，通过大寨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帶領羣众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，战胜阶级敌人、改造自然面貌和人們的精神面貌的事实，概括而具体地反映了为在农村建立、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陣地所进行的斗争，展示了大寨村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生活图景。这篇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党的基层战斗堡垒——农村党支部，和党支部书记，在建設

社会主义新农村中，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！“集体的脊梁骨”则是大寨村史的一部分，简要地记述了大寨村的贫雇农、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，走集体化道路的历程。

叙事为主、夹叙夹议是“大寨高风”描写手法的主要特色。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、行动、思想活动和一个个事件的细致描写，并在叙述中，画龙点睛地插入寓有深意的议论，就把人物和事件的内在思想意义，揭示在读者的面前，因此，有着比较强烈的说服力。此外，陈永贵的那些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语言的运用，亲切近人的笔调，都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光彩。

目 次

在农村陣地上.....	(1)
阵地，在大柳树下.....	(2)
阵地，在虎头山上.....	(15)
阵地，在試驗田里.....	(25)
阵地，在思想深处.....	(38)
阵地，在生活中间.....	(51)
阵地，在堡垒内外.....	(62)
阵地，在四面八方.....	(72)
集体的脊梁骨.....	(86)
又一場爭論.....	(86)
“老少互助组”.....	(90)
“穷人总是向穷人”.....	(99)
“穷孩子”们成长起来了.....	(105)
后 記.....	(108)

在农村陣地上

——記大寨党支部和支部書記陈永貴

太行山，山连岭，岭连山。万山丛中，有一座山峰，名叫虎头。虎头山根，有一个山村，名叫大寨。

“昔阳干部劳动成风”，已经传遍全国。昔阳这风，最初就是从这个山村里兴起来的。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员们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，总是在最前线冲锋陷阵。陈永贵同志解放前二十来年给地主富农当长工，当然是天天劳动；解放后当副村长、农业社长、支部书记，还是长年坚持劳动。当了干部以后，他不是劳动少了，而是更多；不是劳动差了，

而是更好。他不是为了多挣劳动日而劳动，也不只是为了不使集体中减少一个劳动力而劳动；他主要是为做好工作而劳动。为什么工作？为什么劳动？他的目的很明确：为了革命。照他爱说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：“咱是听毛主席的号令，占领阵地哩！”

陣地，在大柳树下

一说“大寨”，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高大的寨墙、森严的寨门，以至威武的炮楼。大寨村并没有这样的大寨子。这里的“大寨”，指的是山谷中村中心的一座中流砥柱似的山丘——一条大山沟，从虎头山上下来，在这山丘两边分成两岔，然后又合成一条沟，通到山下。看来，这个“大寨”，是因为土质比较坚硬，所以千百年来千百万次山洪从山谷里冲下来，把它旁边比较松软的土冲走了，却怎么也奈何不了它。沟越冲越深，它就显得越来越高，成了一座小山，挺立在这大山沟里。

大寨下有一棵大柳树。解放前，人们把

这棵树叫做“苦人树”。不知道多少穷人在这棵树上受过痛苦。哪个穷人不合地主的心思了，就要被扯在这棵树上吊起来。永贵至今难忘，他在十来岁的时候，在山上给地主放牛回来，看到穷苦人李喜吉的女人背绑着两手吊在这棵柳树上哭号。只因为她在路边拾了地主收秋掉下的一个玉米棒，就被地主打着骂着在这树上吊了半天。心中好恼啊，长大了非为穷人出这口气不可！

多少年，这棵柳树野生野长，歪歪扭扭，不成个树样子。穷人天天路过这里，看见它就象看到了自己的苦难，就暗暗地对着地主的大门攥（Zuàn音钻）拳头。

几千年，几百年，山沟里阴风飕飕，大寨下死气沉沉。一九四二年，来了共产党的联络员，来了八路军的游击队，这里燃起了革命的火苗。一九四五年，昔阳解放了，接着党发动群众斗倒了地主富农，这个山村建立了党的支部。从此，这山沟，就充满了欢乐的歌声；这大寨，就闪出了鲜红的光彩。

解放后，永贵特别爱护大寨下这棵柳树。不光是因为生活好了，有心思把山村装

点得好看一些；也因为这棵树连着穷苦人的心。他给这棵树浇水、培土；他给小孩子们讲这棵树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，要他们不要爬上这棵树，不要折柳枝。

在社会主义时代里，这山村里的生产斗争的图画越来越壮丽；同时，阶级斗争的风浪并没有停息。正象挺立在山沟里的大寨经住了千年洪水的考验一样，大寨支部这个战斗堡垒，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，越来越坚强了。支部书记陈永贵，在阶级斗争中总是走在最前线，在生产斗争中也总是走在最前线，在斗争中锻炼成了政治上的坚定的旗手，生产上的熟练的能手。

十几年，永贵和大寨社员们爱护着的这棵柳树，长得又高又大又好看了。组织起来以后，人们常在这柳树底下开会，争论，谈生产大计，定前进方向。渐渐地，社员们养成了一种习惯：每天吃早饭的时候，都聚到大柳树这里，议论当前大家最关心的事情，或者听听有线广播。夏天的晚上，老年人在这里说古道今，年轻人在这里唱歌谈心……

“苦人树”成了“乐人树”；封建阶级欺压

穷苦农民的地方，成了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展开阶级斗争的阵地。

大柳树下，这是大寨人在阶级斗争中短兵相接的阵地。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，从集体化到今天，这里进行过多少次或明或暗、或缓和或激烈的斗争啊！

一九五三年，办社头一年就是大增产，每亩粮食的产量由上一年的一百七八十斤上升到二百多斤。收罢秋，支部在大柳树下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，总结集体的优越性，准备吸收新社员。社员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，“黑鬼”（过去给日本鬼子当过便衣探子的一个反革命分子）突然站起来了。他挺胸叉腰，歪着脖子发了言：“算了吧，不要再夸你们的优越性了。合作社好什么？还不及我单干哩！我的地赖，每亩还打了三百斤，你们地好，你们搞集体化，每亩怎么才打二百斤多一点？”

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风，把场上活跃的空气一时压紧了。社员们被泼了一头冷水，一时没人说话了。永贵明知道“黑鬼”的“亩产三百斤”是当面扯谎；可是，怎么戳穿他

呢？脑子里一个念头一闪，有了主意。他把支委会的同志叫到一边，同他们商量：“咱把大会的开法变一下，先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？”

这一年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。这件事，支部原来的安排是先发动群众总结合作化的优越性然后才宣布。现在“黑鬼”放妖风，反击他的好办法就是先宣布粮食统购。永贵把这主意同支委会的同志们一谈，人人叫好。

大柳树下又热闹起来了。统购统销的办法和任务一宣布，绝大部分社员热烈拥护，“黑鬼”却一下子象散了骨头架子，软成一摊。

永贵在会上说：“不论是合作社、是互助组或是单干户，多打了粮食都是好事情，都要表扬。现在，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计算，自报公议各家的卖粮任务吧！”

“黑鬼”蹲在那里，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巴来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一边打，一边喊：

“我这嘴，不成嘴！是屁嘴，是贱嘴！我是胡说哩，我一亩实实在在只打了一百六十

斤，连秆秆也沒有三百斤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打了那么多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……想单干下去，我……我不愿意入社，又……又怕……怕別人都……都入了社，再沒人帮……帮我种地了……”

“说多说少，光依你哩？让群众评议评议吧，要大家都承认你打了多少，那才算。”

第二天，“黑鬼”挨门挨戶求告：“我的产量的的确确沒有我在会上说的那么多，我假报产量是想和合作社对垒哩。我这嘴太坏，我犯了错误了……”

真沒打那么多，当然也不能强迫他多卖。群众评议之后，承认了他说的一亩一百六十斤“差不离”。

那年冬天，全村家家户户报名入社。曾经凭仗自己的“四好”（土地好，牲口好，农具好，劳力好）同合作社比赛的富裕中农贾寿元，也入社了。

“从春天到秋天，我天天看着社里的庄稼。社里秋收打場，我看得更仔细（按：社里的打谷場就在他家门口）。社里打一場，

我记一笔账。社里会计在场上记账，我在自己窗户里面记账。社里随打随分，分一户我记一户。跟我的土地、劳力差不离的几户社员各自分了多少，我记得特别清。贾正元（按：也是一户富裕中农）分的粮食，比我家打的粮食多两千多斤。这集体就是沾（按：“沾”，是好和行的意思），我服气了！”——这就是贾寿元当时在大柳树底下又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的话。

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人，从此就都死心塌地了吗？没有。到那一天还早着哩！

初级社里，大柳树下年年有争论：多数人主张劳力股多分；少数人主张土地股多分。永贵和支部的同志们坚持了逐步降低土地报酬，逐步提高劳动报酬。

转高级社，这里有更激烈的争论。贫农社员说：“这一下土地才真正还了家，谁也夺不去了。”“这回真翻身了，不受土地股的制了。”少数富裕中农说：“这是高粱秆剥掉了皮，成了光秆了；黑豆碾掉了皮，光剩下仁（人）了。”永贵和支部的同志们耐心地讲清了完全按劳分配的好处，说服了留

恋土地报酬的人，贫农下中农更加理直气壮起来。

再往后呢？斗争还是低一阵高一阵。最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五七年阴风怒号的那些日子，城市里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进攻，农村里的妖魔鬼怪也又杀气腾腾起来。

富农贾登元的大儿子贾喜祿，因怀恨土地改革而得了“神经病”。这个“神经病”的神经不知为什么竟是那样机灵。不知他听到了什么风声，忽然装出来一副更疯狂的样子。他一手拿着一本变天账，一手拿着一把切菜刀，东游西晃，大嚷大叫：“东房三间是我的！南房三间也是我的！”他跑来跑去，跑到陈永贵和别的两户贫农一起住的院子外边，在沙石磨台上磨起刀来。一边磨刀，一边喊叫：“杀陈永贵！”“杀陈永贵！”瞪着大眼，咬牙切齿。

这个“神经病”的反动的阶级观点是多么清楚！贫农弟兄们警觉起来了。大柳树下，社员们议论纷纷。许多人也磨拳擦掌，两眼冒火。

一天大早起，永贵开了大门，朦朦胧胧

看到门边站着一个人。“谁？”“我。”听声音是住在隔壁的贫农社员赵大和。“大早起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“我好几夜沒睡了，怕那狗日的真要来行凶哩！”原来，大和是自动来做警卫工作的。永贵说：“怕啥？放心吧，我也睜着眼哩。他真敢拿刀上门，饶不了他。”

大寨支部的同志们既沒有麻痹，也沒有惊慌。正是借用反面教员提高社员们的阶级觉悟的好时机啊！支部开会决定：要多加小心，也要沉住气，暂时不要反击，看阶级敌人能撒出多少毒气来！

果然，就在那时候，办社头一年就攻击合作化的那个“黑鬼”，又疯狂起来了。这一回，他想在统购统销上点起一把火来。白天，他还不es敢太张扬；黑夜，他就到处钻动，煽风点火。

起初，听到几个富裕中农社员在路上讲：“入了社，由不得自己了。粮食都让人家拿去向上级讨好了……”后来，听到有的觉悟不高的贫农社员也说：“永贵的心坏了，胳膊往外拐哩，不向咱村人了。”还有

的说：“打多少粮食他就往上报多少，卖粮一年比一年多。他光想当模范，上省里吃白馍哩！”

怎么回事？支部的同志们到贫农群众中一查访，原来是“黑鬼”暗地捣鬼哩。“黑鬼”夜晚走这家串那家，对一些人唧咕：

“别村喂的狗是往外咬，咱村喂的狗是往里咬。粮食不卖给国家那么多，咱村不家家发财了？陈永贵死不了，咱大寨人活不长！”

从各家各户到大柳树下，从大柳树下到山上地头，一场大辩论又展开了。

支部的同志们摆事实，讲道理，不慌不忙，沉着应战：

——卖粮是一年比一年多，可是社里打粮食一年比一年更多，社员们的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更多……这些，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个账本本，回家可以仔细算一算。

——别忘了，要是没有党的领导，没有国家的支援，咱们怎么能年年增产！贫农下中农都想想，咱们是怎样从过去一年只吃一百多斤粮食的苦日子里跳出来的。富裕中农也算算，你们入社以后这几年增加的收入是